

主编 李天纲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心理学（第二辑）

儿童心理的研究

〔法〕福禄贝尔 著 吕亦士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主编 李天纲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· 心理学（第二辑）

儿童心理的研究

〔法〕福禄贝尔著 吕亦士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儿童心理的研究/李天纲主编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7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. 心理学)

ISBN 978-7-5520-1772-4

I. ①儿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儿童心理学—研究 IV. ①B844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2046号

儿童心理的研究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

电话总机 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排 版: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印 张: 10.5

字 数: 15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1772-4/B.178

定价: 62.00元(精装)

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（Ma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：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（文）、（历）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，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榫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；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苞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『易卜生专号』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『马克思专号』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『杜威专号』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间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问题。』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『活学活用』、『急用先学』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『西学』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『救国』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，这就是『天经地义』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『实用主义』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『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』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的情况来看，『民国西学』是一个比北大『启蒙西学』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『五四运动』及其启蒙大众的『西学』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北大的『启蒙西学』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『民国西学』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『启蒙西学』纳入『民国西学』体系，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『冲击』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『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』。反过来说，『翻译』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『会通』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『超胜』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『民国西学』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(法) 福祿貝爾 著 呂亦士 譯

兒童心理的研究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

序

這是我介紹福祿貝爾學說第二部的書了。當我介紹第一部書——母遊戲——以前的時候，我對福氏學說雖沒有如我友人所想的這樣忠實，但至少他的學說於我有特殊的愛好。我看社會是黑暗的痛苦的，天真而快樂的只有兒童，幼稚園是兒童的樂園；我願意天下的兒童都到樂園裏來，也希望把這種樂園推到人世間裏去。我從北返南，送友人的墨盒，常常鐫上聖經裏「讓孩子們到我這裏來……」的話頭。我行為如是，我思想如是啊！猶憶整理母遊戲的時候，我正困守北大三院之日，忍寒耐餓的環境，天天還有空中的炸彈飛來，但那時整理的工夫，毫不受些許影響；只要翻開了書本，好像有另一世界展開在我的眼前了。可知思想中自有樂土，我精神本來是啊！

母遊戲告成以後，頗感到自己學識的淺陋，轉想從生物學心理學重打根基。科

學於我，明我之所未明，見我之所未見，使我十年來體驗融會求學的工夫，變作客觀的研究。知識的所得日多，精神的重心日失，自後我漸有「木葉辭枝，飄零隨風」之感了。

去年以來，我離開故鄉，息影於城外的香山。有時候常獨自拿了書本到山上去讀，或有時走向山下村店中喝幾杯白酒。形式上又恢復到少年時期浪漫的生涯，但思想的苦悶到底打不出路來。從上春校勘了一部美國幼稚園與初小低年級的課程指導書，又看了一本崔載陽譯的蘇俄小學課程，稍覺得教育上注重現在並不放棄將來的學說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。如有人以為注重現在是教育的出發點，當然我可以承認不放棄將來便是教育的歸束點了。最近呂亦士女士復以本書的譯稿絡繹見示，修改整理之餘，更覺教育之期求雖因今古人時代不同而異，但依據現在的兒童，發展是有一定的趨向，實為不可磨滅的事實。今後，我其憑藉這一點的摸索，做黑夜孤舟中的星辰罷。

一九三〇，一〇，一七，張雪門識於平西的香山。

目次

引言

關乎身的

第一章

活動的本能或筋肉的訓練

四

第二章

求知的本能或感官的訓練

一九

關乎心的

第三章

力的本能或情緒的訓練

四一

第四章

愛的本能或感情的訓練

五一

第五章

連續的本能或理解的訓練

六一

第六章

判斷的本能或是非的懲罰

七八

第七章

認識的本能或意志的訓練

九五

關於靈性的

第八章	敬畏的本能或崇拜的訓練·····	一一八
第九章	模仿的本能或信仰的訓練·····	一三三

引言

在教育界裏的人已經知道那搖兒童的搖床的人，是真正管理領導全世界的人。兒童第一年的生活就當注意，他們一切的生理發展都當小心。因為成人的健康是在於幼年養育的。到了福祿貝爾——幼稚園第一個創辦者——才對於兒童的一切的本能上訓練有了正誤的注意，那時很少有人想到這是與後來人格上有極大關係的。

這些兒童們生來就有的表現，慈愛的母親們是常拿牠們當作趣事看待，或引為玩笑之資，却少有理會到這是一件應當注意的正經事情。因為這個緣故，福祿貝爾曾招請了做母親的去研究，他叫這種研究是「母親時代的科學」。

從調查中，知道一種似乎無意味的本能，實為世界上永久的明確之根。所以幼稚

園便是一個緊要的事情。做母親的可以從此中得益不少，明瞭她的子女是第一件事；因母子間的關係密切，所以對有些的本能便不能不想出一種適宜的刺戟來，這又是第二件事；且更明瞭子女們成熟的年齡，以及各個年齡的不同。「兒童的時代是成人時代的父親」這句話在人格方面和生理方面都是一樣。我們已經知道早年的迷信觀念留給我們有最深刻的印象，對於一切做事方面或看見了一種情況就以爲不祥，都是使我們不能改掉的。如此，我們就可以感到幼年時代的印象，是怎樣的重要了。

福祿貝爾說過：「一個國家的命運，操在婦女們的手中的成分實多於男子，也就多操在做母親的手中而不在那些有權有勢或改革家的手中，因他們尙不能澈底明瞭他們自己呢。我們應當培養教化一班婦女，爲着她們是人類的教育家，否則將來的人類仍是不能成爲完善的」。

在世界各種重要的事業中，去明白兒童的一切，使他們得着合宜的發展，便是各

事業中重要的一件。完全的明瞭，全靠在婦女們最大的努力，廣博的修養，完全的自制精神，並明白自己的機智以及環境。所以她必須有爲醫生，美術家，教師，詩家，哲學家及傳道者的職志。同時她自己也可從科學，歷史，美術，文學，人類學等得到不少的智識，這不是從別種的修養所能獲得的，因爲要澈底明瞭兒童，是必須借着各種學科的幫助，而非爲個人自己的求榮而研究各科學呀。

以下的幾條是從科學的基礎上供給研究兒童教育的事實：

第一條：兒童自己本有的本能，是可被以後的環境改變的（給改好或變壞）。

第二條：各種本能自存在後，卽有極明顯的表示。

第三條：由做母親愛的引導，可使未定的本能變成無疑的主見（Insight）。

主見和本能的分別，容我例證於下：有一位母親研究過幾個月福氏的學理，把她四足歲的兒子送到我們的幼稚園。我覺得他自決心很薄弱。有一天，我和他母親談到他，她問這是什麼緣故？我說，如果這個小孩的母親不是善感的無定見的人，一